

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1909-1949)

——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

孟化著

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1909-1949)

——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

孟化著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1909~1949: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孟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01 - 013861 - 9

I . ①国… II . ①孟… III.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馆史- 1909~1949

IV. ①G259.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4227 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3861 - 9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国家图书馆的设立和发展 (1909—1949) / 13

 第一节 从古代藏书处（所）到近代藏书楼和图书馆 / 13

 第二节 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的设立 (1909—1911) / 19

 第三节 国家图书馆的变迁 (1911—1949)

 ——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 / 26

本章小结 / 60

第二章 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收藏、整理与文化传播 (1909—1928) / 63

 第一节 “酝酿期”的文献收藏 (1909—1911) / 64

 第二节 “初创期”的文献收藏、整理与传播 (1912—1928) / 67

本章小结 / 104

第三章 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收藏、整理与文化传播 (1929—1949) / 107

 第一节 “兴盛期”的文献收藏、整理与文化传播 (1929—1937) / 107

 第二节 “衰退期”的文献收藏、整理与文化传播 (1937—1945) / 139

 第三节 “复原期”的文献收藏、整理与文化传播 (1945—1949) / 165

本章小结 / 174

第四章 国家图书馆与近代中西学术 / 177

第一节 国家图书馆与中国传统学术 / 177

第二节 国家图书馆与近代西学 / 205

本章小结 / 222

结语 / 225

参考文献 / 229

附录 / 237

后记 / 245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图书馆作为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文化机构，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图书馆通过特有的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方式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并参与到文化建设当中，与文化和社会产生互动。

纵观世界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图书馆与文化密切相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古苏莫国和尼尼微皇家图书馆，到亚历山大和波尔加马图书馆，再到罗马的乌尔匹亚那图书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图书馆的发展与兴衰都伴随着文化运动的发展以及文化中心的转移。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出现于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和美国。而公共图书馆和大学的快速发展，成为欧洲文明大幅进步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大约在 20 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学者提出，“中国有 3500 年连续不断的图书馆事业”。此种说法并不确切，至清末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或者说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只存在藏书活动，而没有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活动。从历史事实看，1901 年清朝“新政”和 1906 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时期，才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时期。所以，所谓“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实际上是“中国古代藏书活动史”，其具体演变过程是：“早期的藏书活动——西方图书

馆观念的传入——改良派和维新派力主学习西方图书馆——向近代图书馆转型。”^①

中国近代文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救亡图存密切联系，兼纳多种文化类型。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文化机构图书馆，也经历了新旧斗争直至交融的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在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上有着很浓重的痕迹，最终旧的封建社会藏书制度解体，近代图书馆理念在图书馆事业中得以实施，中国图书馆学得以建立和发展。

我国现在最大的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于清朝末年开始筹建，1912年正式开馆，对外开放。国家图书馆是中国第一个国立公共图书馆，也是中国历史上保持国家图书馆身份最久的图书馆（在中央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成立之前，虽无国家图书馆之名，但实际代行此职责）。最初，领辖和直接管理京师图书馆的是清政府的学部。北洋政权成立后，京师图书馆又归北洋政府教育部管辖。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改北京为北平后，国立京师图书馆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政府1928年成立时下设有大学院，主管文化教育。同年的7月18日，大学院发出通知：“旧京师图书馆，奉中央命令，改为北平图书馆，现在派员筹备。”7月24日，正式通知京师图书馆改名，并明令属大学院管辖。

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历程密切相关，可以说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国家图书馆的成立。近代中国面临着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危险，有识之士从倡导“中体西用”到逐渐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用”，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其“体”，要开启民智，普及知识。而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阵地图书馆被引进中国，被寄予社会教育的重任。由清政府创设的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就是在西学传入中国，国内图书馆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为挽救清政府统治和救亡图存而设立的。

国家图书馆通过图书馆的基础业务——文献收藏、整理、开发利用，为

^① 蒋永福：《图书馆学通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提供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服务，在保存文化、传播知识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馆的身份优势和资源优势，促进国内图书馆界的联合和发展。在近代社会教育和近代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丰富深化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内容。

由于时代动荡，局势混乱，在 1909 至 1949 年间，国家图书馆几经起伏，馆务时续时断，馆址几经变迁，办馆宗旨也有所变化，其在文化建设的知识传播方面也呈现出几个阶段性的特点，基本上随着近代文化的兴衰轨迹而变化，可以说国家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是构成近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两者息息相关。同时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一旦产生，就有自己的独立性，也有与近代文化发展不太一致的地方。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抗战时期近代文化建设设备受摧残而凋敝，而国家图书馆通过努力保存了西南地方文献以及抗战史料等珍贵的文化遗产，取得了一定成绩。

通过对这一时期国家图书馆这个重要文化机构的探索，追寻其文化建设与传播的历程，可从一个侧面丰富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内容，也有助于正确认识其在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国家图书馆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在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挥文化机构的作用、如何保存和建设文化等方面都有许多经验和教训，也给今日的图书馆建设以启迪。

在国家图书馆百年历程中，馆名经过多次变更，先后沿用过京师图书馆、国立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名，直至 1998 年定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在 1949 年前，京师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的主要称谓。

结合中国近代的时代特征以及国家图书馆在 1909—1949 年间的实际发展情况，笔者将这一时期的国家图书馆粗略概括分为“酝酿期”、“初创期”、“兴盛期”、“衰退期”、“复原期”五个时期。其中 1909—1911 年为“酝酿期”，国家图书馆此时虽然任命了负责人员，并下令调拨入藏文献，但并未实际开馆运营；1911—1928 年为“初创期”，国家图书馆几经迁徙，终于开馆运营，初具规模；1929—1937 年为“兴盛期”，合组后的国家图书馆急速发展，在图书馆界内以及近代文化史上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1937—1945 年为“衰

退期”，时局的动乱严重影响了国家图书馆的馆务，国家图书馆处于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状态，虽经国图人的不懈努力，在文化建设上取得一些成果，但仍无法弥补战争对文化的摧毁；1945—1949年为“复原期”，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国家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能量，在恢复整理的基础上，重张文化建设大业（具体论述详见第一章的论述）。

二、学术史回顾

1909—1949年间国家图书馆跨越了清朝末年、北京政府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伴随着中国近代的急剧变化，其自身逐渐完成近代图书馆转型。在保存整理文献的基础上，传播中西文化，进行社会教育，在近代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百年过去了，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史的角度对这一研究的成果颇丰，但是从近代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其地位和意义，还颇为欠缺。

1. 综合研究和资料汇编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亦称“中国图书馆发展史”，是研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其分支学科有：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中国当代图书馆事业。研究内容主要有：先秦藏书事业的起源与形成，汉以后历代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院道观（宗教）藏书事业的发展，历代藏书机构的演变、藏书楼考，古代藏书与目录学、分类学、校勘学、版本学、文献学的关系，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变，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成就、经验与教训等。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原为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开设的课程之一，现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重要的分支学科。台湾方面研究比较发达，代表性著作如严文郁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1983年；庐荷生著《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86年。其中也保留有大量的关于国家图书馆在近代的史料，但是由于立场的不同，带有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

有关的资料汇辑有 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 1982 年版）；1988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邹华亭、施金炎著《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1988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馆事业纪事》、1988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雁著《续补藏书纪事诗传》、1992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其中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的出版，改变了大陆学界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薄弱状况，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上各书，有以史料见长，提供图书馆史研究基本史料；有以年系事，提供图书馆事业发展线索。但从编排体例看，有不完善之处，运用材料也有欠准确之处。

有关传记辞典有郑伟章和李万健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1986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麦群忠主编《中国图书馆人名辞典》（1987 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又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1987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出版，有助于人们了解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家、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同时通过对这些学者的研究也深化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其中郑伟章和李万健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最为完善，它不仅评述藏书家故实，并注意他们在文化学术上的成绩与藏书的关系，对理解人物、评价其历史地位有帮助，后两书收罗较多，广及历史上与图书馆有关的人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①

鉴于以上著述的不足，在 2009 年国家图书馆百年馆庆之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1909—2009）》（李致忠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李致忠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李致忠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为学界提供了更多翔实的国家图书馆资料，填补了近现代国家图书馆馆史著作的空白。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以国家图书馆历史为主线，按照编年分段的章节体例编辑，章下分类，收录 1909 年至 2008 年发表及未发表过的有关国家图书馆的资料。

^① 谢灼华：《评建国以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图书与情报》1989 年第 3 期。

内容包括馆务运行、书刊访购、编目加工、藏书建设、读者服务、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等。比起 1992 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更加全面和系统。但是馆史资料的编辑和馆史分期以国家图书馆发展为主要标准，重其内部发展脉络的史实叙述，在时代变迁、文化背景方面很少论述，忽略或较少提及相关的文化因素。而有关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的专题更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相信随着第一手的馆史资料的面世，会使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一方面的科研中。

2. 专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将近三十年，关于中国图书馆史专门论著处于空白状态，部分出版社只为古代藏书楼研究出版了古代藏书、目录、版本方面的著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有关图书馆史以及藏书文化的研究日趋繁盛，出版了一大批史料以及研究著作。

相关的专门论著有 1985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宝华和韩德昌著《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1987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谢灼华著《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1991 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酉梅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1991 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吴仲强等著《中国图书馆学史》、1993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程亚男著《图书馆与社会》、1996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吴晞著《从藏书楼到图书馆》、1999 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李雪梅著《中国近代藏书文化》、200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来新夏等著《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2001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2001 年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傅璇和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2004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程焕文著《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2004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陈燮君和盛巽昌主编《20 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延伸轨迹的时空组合》等。

其中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则是一部由 20 多位历史名家参与编写、字数达到 150 万的三卷本大部头著作。该书的特点是论多于述，但由于内容庞大、书成众手，也难免有失误之处。这是第一部用通史体例对中国藏书自古至今、周密细致地作了系统论述的专著。《中国藏书通史》全书 110 万字，

被学术界赞誉为一部弘扬藏书文化的学术力作，集中国藏书文化之大成，填补空白的中国藏书文化通史。全书以史为经，以藏书事业为纬，自先秦至晚近，分为 8 编，贯穿古今，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图文并茂。该书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编著虽尽皆专家通人，仍不免有许多疏误之处。程焕文著《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以西学东渐对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影响为考察对象，在掌握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现有资料，并搜集了大量的报刊、文集、日记、奏报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有颇多创新之处。

以上著述观点概分两类，一类认为中国的图书馆自古有之，藏书楼是图书馆的前身；一类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应区别看待。笔者倾向后一类观点。虽然观点不一，但有关藏书史料的充实，也为近代图书馆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资料。它们或以图书馆的建置、或以图书馆学的发展、或以藏书楼向图书馆的转换、或以断代图书馆学术史为主题，研究各有所长，并根据不同历史分期对京师图书馆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有或多或少的涉及，肯定了京师图书馆建立是国家图书馆事业崛起和形成的标志，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经历了大发展和大衰退。但都限于泛泛而谈，未能作深入的展开。其中有几位研究者从文化的角度对图书馆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谢灼华比较早地从文化史的角度评价了图书和图书史的关系，李雪梅对近代藏书文化做了系统的探讨，程焕文对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研究填补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空白，陈燮君从文化名人与图书馆的互动互助的视角对 20 世纪的图书馆做了文化探讨。

相比论著，有关图书馆与近代文化的文章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选题多样，数量渐多。仅以京师图书馆或国立北平图书馆为题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约有近三十篇，兹选择重要者论述如下：

首先，是关于近代文化名人与国家图书馆的关系研究。

李致忠近年来致力于近代文化名人与国家图书馆关系的研究。他在《鲁迅与京师图书馆》^① 中认为作为中国著名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在寻找新馆址和借阅、捐赠图书方面，为京师图书馆及其分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① 李致忠：《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 年第 1 期。

的贡献。他还撰写了《梁任公与国立京师图书馆》一文，从他创建松坡图书馆，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主席与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艰难履职、克己奉公，遗书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等角度，详述了梁启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作出的突出贡献，以追念这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鞠躬尽瘁的老馆长^①。

张廷银在《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②中从京师图书馆即“清学部图书馆”，缪荃孙编纂《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和《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等角度详细而深入地考证了缪荃孙在京师图书馆藏书编目中的贡献，深化了对此问题的认识。

朱天策在《梁启超与京师图书馆》^③中论述了梁启超对近代图书馆的积极倡导之功及对国立京师图书馆的贡献。

焦树安在《京师图书馆早期的三位馆长：缪荃孙、江瀚、夏曾佑》^④中对这三位馆长在选址、开馆、经费筹集、规章制度、编制善本书目和解决馆舍等方面贡献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他还撰写《国立北平图书馆学者传略：张宗祥、徐森玉》^⑤对张宗祥、徐森玉二人在文献整理的贡献做了细致梳理。

张秀民在《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⑥中从创建新馆、充实馆藏、利用图书、战时服务、保存善本、培养人才、方便读者、协助友馆、著述等身等方面系统述论了袁同礼先生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作出的杰出贡献。

其次，关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及国家图书馆发展、变迁方面的研究。

翟志宏在《学部与京师图书馆创建》中分析了京师图书馆创建的过程，认为学部的作用至为关键，其表现有奏设京师图书馆，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章程，征调图书确立馆藏基础等^⑦。他在《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⑧文中认为清末京师图书馆的倡办，有三个至为关键的人物：侍郎李端棻、罗振玉及最为关键的学部尚书张之洞。京师图书馆成立后，在清末短短的两年多

^① 李致忠：《梁任公与国立京师图书馆》，《文献》2009年第1期。

^② 张廷银：《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文献》2008年第4期。

^③ 朱天策：《梁启超与京师图书馆》，《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

^④ 焦树安：《京师图书馆早期的三位馆长：缪荃孙、江瀚、夏曾佑》，《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年第4期。

^⑤ 焦树安：《国立北平图书馆学者传略：张宗祥、徐森玉》，《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1期。

^⑥ 张秀民：《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

^⑦ 翟志宏：《学部与京师图书馆创建》，《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年第3期。

^⑧ 翟志宏：《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草创期间，除了解决人事、关防印信、经费等基本问题外，还在图书收聚等方面成绩显著。此中原因，与馆长缪荃孙有关。清末京师图书馆草创的基础，为民国后的对外开放、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该文对于研究京师图书馆的创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最后结论仍有值得斟酌的地方。翟志宏在《五四前后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① 中提出：五四前后京师图书馆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进馆藏及利用：确立、运行出版物呈缴制度，拟订征集图书简章、变通捐助图书褒奖办法，开展馆际互借、互换业务。丰富馆藏之余，该馆还努力推进古籍的利用。二是完善管理：解决馆址安置，完善章程，并签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办该馆。五四前后是京师图书馆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发展为后来该馆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镇铭在《京师图书馆的基础藏书及其渊源》^② 中对京师图书馆 10 种藏书及在采集图书方面遵循和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渠道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程磊在《罗振玉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③ 中着重论述了罗振玉在京师图书馆创建中的贡献。

李致忠还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④ 一文中分析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国立京师图书馆设立中的作用。他认为：庚子赔款之后，美国出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考虑，先后两次退款于中国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便是当时管理退款的专门机构。1925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后依教育部令，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

张书美、刘劲松在《中基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历史贡献》^⑤ 中详细论述了中基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① 翟志宏：《五四前后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

② 李镇铭：《京师图书馆的基础藏书及其渊源》，《北京图书馆馆刊》第 Z2 期。

③ 程磊：《罗振玉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江西图书馆学刊》1983 年第 3 期。

④ 李致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 年第 1 期。

⑤ 张书美、刘劲松：《中基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历史贡献》，《图书馆》2009 年第 5 期。

翟志宏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危机应对》^① 中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战争危机，为避免战火洗劫，国立北平图书馆所采取的应对举措有三：一是馆藏的保护。为减少损失，该馆挑选图书装箱，将大量的珍贵图书分存国内不同地点，并有南迁、善本秘密运美等行动。二是馆藏的扩充。如征集抗日史料、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珍本书籍入藏等；此外，西文科学杂志、西文书籍等也有扩充。三是馆务的开展。抗战时期馆务工作主要分为北平和昆明两部分，长沙、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因需要设有办事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相对而言，国立北平图书馆受损要小于同时期的其他图书馆，从战后的统计资料来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时期的应对措施是成功的，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效应予肯定。该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出的突出贡献。

再次，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方面的研究。

刘波等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及影印出版敦煌遗书史事钩沉》^② 一文中钩稽排比国家图书馆旧档中有关拍照影印敦煌遗书的档案文件，辅以其他资料，再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20 世纪 30 年代拍照并计划影印敦煌遗书的史实，认为此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的回归，促进了中国早期敦煌学的发展，而且对今天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献的回归也具有借鉴意义。

魏训田在《抗战前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聚散考略》^③ 中认为：经过 20 余年的辛勤搜集，到 1931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藏书机构。1933 年 1 月，该馆奉命将藏书精华装箱南运，分存于上海、南京两地。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存书精华部分被秘密运往美国寄存，其余存沪、存宁、存平图书则被日伪控制。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除存宁部分舆图被运往台湾外，其余均重新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的善本精华，则于 1965 年 11 月入藏台湾国民党“中央图书馆”。

① 翟志宏：《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危机应对》，《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0期。

② 刘波、林世田：《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及影印出版敦煌遗书史事钩沉》，《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魏训田：《抗战前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聚散考略》，《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萧均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之回顾》^① 中对《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的创立、变迁和学术影响等方面做了总体介绍，并从关于目录的情况、关于专著的情况、关于馆刊专号的情况（一是二卷二、三号合刊的《永乐大典专号》，二是四卷三、四号合刊的《西夏文专号》，三是七卷三、四号合刊的《圆明园专号》）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回顾，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题可见，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的关系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图书馆藏书文化、图书馆与文化名人、图书馆馆史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范围还有些窄，比如多集中在著名的馆藏和知名的馆长及政府要员，研究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扩展。此外如读者服务、学术交流、开启民智等方面缺乏发掘和深入探讨。由于国家图书馆在近代的名称几经更改，且中间又涉及分馆的建设以及合组等事宜，许多学者多采取断代研究方法，对于国家图书馆的近代文化历程缺乏一个系统的梳理。

此外在诸多图书馆史、出版史、新闻史等研究综述或者专题研究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京师图书馆或者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探讨，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其文化意义和地位，肯定了其在文化保存和传播知识方面的价值。但由于篇幅所限，或视角的不同，未能作为论述和研究的重点，偏于泛泛。

因而本书试在对近代国家图书馆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基础上，探讨其在近代文化中的意义，以改变以上的研究现状，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应有的重视，并正视其局限和不足，更深入地理解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存在粗浅粗糙的特点。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本书欲从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图书馆史的角度对国家图书馆（1909—1949）的发展历程、文献收藏整理与传播、与近代中西学术关系等方面做一全面考察，力图揭示国家图书馆在近代文化史中的真实面貌及其地位。下面就其关键点做一简要

^① 萧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之回顾》，《文献》1982年第4期。

说明：

1. 国家图书馆在近代名称多次变更，为叙述清晰，笔者从1909年至1949年间沿用时间较长的两个主要名称——京师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出发，考察之间的沿承发展。

2. 名称更改的背后寓意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政权的变迁和经济因素，只有将多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才能了解国家图书馆办馆方针的变化和文化建设的历程，才能凸显其在近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在分期标准上，兼顾图书馆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时代背景。

3. 针对以往研究孤立考察京师图书馆或者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情况，侧重两者间的关系和异同研究，考察深层次的理念和政策的扬弃。

4. 对于合组前的北京图书馆做独立的考察，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5. 通过对国家图书馆(1909—1949)年间的馆办刊物以及同仁著述的整理，考察其参与近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6. 史料的搜集方面：

第一手的资料除国家图书馆档案外，还有馆务报告、馆刊、《读书月刊》、大公报图书副刊以及国家图书馆同仁所写的论文和专著；

资料汇编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等；

民国时期相关文化名人日记和回忆录等，如《袁同礼文集》等。国家图书馆成立百年之久，不少文化名人或参与领导、或参与建设、或受益于国图文献服务、或从国图成长发展，都与国图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